

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的制度路径分析

李为君,王忠春

(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510)

摘要: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这个工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制度有着对于荣辱信息的知会功能和荣辱行为的奖惩功能,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式制度软化和良性非正式制度的边缘化导致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过程中制度功能的失调,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的制度路径就是通过提升正式制度执行力和限制恶性非正式制度,实现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和践行。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2)06-0076-05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社会上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元化,出现导致了动摇道德伦理大厦基石和不良社会风气泛滥的荣辱观错位和倒置现象。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这种缺位状态与制度功能的失调密不可分,所以如何发挥制度在培育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作用,这是研究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路径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制度对于荣辱观建构的功能

“制度形塑行为”是西方新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其意蕴是实现制度的稳定性和能动性,把制度塑造成“一种关键性、干预性变量”,从而实现对行动者的约束和激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斯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1]由于人总是生存于一定的制度之中的,即人都是“制度中人”,外显的约束(正式规则)和内隐的约束(非正式规则)发挥着“限制了人的行动选择集合”的作用。正如罗尔斯所说:“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2]所以要使人们成为具有正确的荣辱意识及行为的人,制度的作用不可偏废,特别是在错位的荣辱观念和行为泛滥时,能够体现道德文化精神和达致良好社会风气的制度安排往往是培育具有社会价值导向功能之荣辱观的突破口和生长点。

(一)荣辱信息的知会功能

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匿名性和人的有限理性,人们对于信息是有一定依赖性的,“人们对秩序化信息的依赖源于个人无法游离于自己特定的社会生活过程,而且个人在理解自身运作的能力上有一种逻辑上的局限,只有依靠必要的信息积累,才能有效指导个人行为。”^[3]个人是以社会所提供的荣辱信息作为其荣辱观的认知来源,制度提供给人们什么是荣、什么是辱的一整套信息。青木昌彦认为:“制度以其简略形式传递着相关信息。……体现在制度当中的浓缩信息使得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能够有效地收集和利用信息,这些信息是使

收稿日期:2012-10-05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体系及培养路径研究”(08JDC129)

作者简介:李为君(1976-),女,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其行为与变动的内外环境保持一致所必须的。”^[4]正是这些有用的战略信息,影响到了人们的认同、自我想像和偏好,可以自主做出行为荣辱的判断,构建了什么是荣、什么是辱的认知模式。制度正是以通过荣辱信息的知会功能,即人们会把法律、习惯等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信息置于个人理性决策观念和行为是荣还是辱的考虑之中,来实现个人对自身和其他人荣辱观念和行为的认知。

(二) 荣辱行为的奖惩功能

人是一种有缺陷和弱点的动物,犯错误必不可免,所以人的观念和行为是无法达到至荣境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法,但有时人需要一定的刺激,才会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通过制度的奖惩功能实现褒荣惩辱。所谓制度的奖惩功能就是对于人光荣性行为给予奖励,对于人的可耻行为给予惩罚,让人们看到遵守的好处和违规的后果。这是因为人在进行一定行为时,总是权衡其付出的成本和所得的收益,即一是要降低行动的成本,二是要提高行动的收益,制度对于荣辱行为的奖惩就是通过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实现对人行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当然制度对荣辱行为既可以明确的显性奖惩,也可以是隐性奖惩。

制度对于荣辱观的建构有着重要作用,甚至有人提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的观点,但是由于实践的复杂性及制度安排探索性,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制度羁绊,所以制度对于荣辱信息的知会功能和荣辱行为的奖惩功能,会出现失调,进而导致荣辱倒置。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建构中的制度功能失调

在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荣辱错位或者倒置的观念和行为现象不可避免的存在,但是在我国这种现象呈现出蔓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与制度在建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功能失调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在社会主义荣辱观建构过程中制度的功能失调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的制度路径选择的前提。所谓制度功能失调是指制度在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过程由于制度安排的偏差所出现的信息知会和行为奖惩功能的强度弱化和方向逆转,导致制度功能的虚置。这主要表现在制度的信息知会功能本应提供关于荣辱认知的正确的、有利于社会良性秩序建构的信息,但提供给民众的信息是人们以丑恶、可耻的观念和行为为荣的信息;制度的荣辱行为的奖惩功能本应做到可耻行为受到惩罚,但是出现了可耻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倒收益颇丰的尴尬。制度功能的失调给人们提供的预期受益的信息:“在这个社会制度中,奉公守法者寒酸,贪赃枉法者富甲;弄虚作假者升迁,据真禀实者遭贬;吹须溜拍者受宠,犯颜直谏者被整;走前门正道者被拒,歪门邪道者得逞。”^[5]如何避免制度功能失调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追溯导致制度功能失调的原因,当然在此的追溯仅局限在制度层面。在现阶段制度功能的失调主要是因为正式制度的软化和良性非正式制度的边缘化。

(一) 正式制度的软化

制度软化是指即使制定了法律和规章,它们也不被遵守,不易实施。作为由宪法、法令等构成的正式制度有一定的强制性,是对人行为的刚性约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制定了不少正式制度规则,即我国并不是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如对于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权毁约、偷税漏税、走私贩私、赖帐不还、贪污受贿等等行为,都可以在刑法、产品质量法、商标法、合同法、税法、行政法以及党纪政纪等制度当中找到处罚的相关条款。由于人们对制度的主要认知是如何去利用制度、绕开制度甚至违背制度以满足自身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诉求,导致制度实施机制的难以落实。没有实施机制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文和(挂在墙上的)规章制度只能是制度的纸制复本,弱化了对人的行为约束力。这通过中国大陆的各项正式制度实施时各项指标在世界的排名状况就可以体现出来,如作为衡量政府规制及其执行水平的商业环境指数排在93位,衡量公共领域的腐败猖獗程度的腐败指数中国以3.5分排名78位,衡量法治水平的法治指数1、法治指数2分别排在118位和69位。目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存在着一系列违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行为,与法律、规章等对其约束力的弱化不无关系,如有的腐败分子在被查处后说,“组织的管理监督对我而言,如

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如果人们从荣辱倒置的行为中获得收益而没有得到制度的制裁或者是获得没有体现制度权威的较轻处罚,那么制度暗含的激励结构会使荣辱倒置的观念和行为呈现出扩散效应,作为正式制度软化副产品的流氓、无赖、不法商人、腐败官员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进而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失去了正式制度的支撑和保障。

(二) 良性非正式制度的边缘化

非正式制度通过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软约束,激发人们的内心理念来实施一定的行为,它是长期演化或适应于短期特定环境而产生。在中国由于人们长期以来是在讲究人情、血缘和面子等文化浸染和缺乏正式制度的保障下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导致其观念和行为习惯对非正式制度的依赖性。从非正式制度对人具有某种决定性影响上来看,非正式制度已经是中国社会构造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属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6]这是按照某种习惯不假思索地作出的,或者说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文化‘强外在约束’自身的水平上进行的,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根据其是否与正式制度是否相容,非正式制度分为良性非正式制度和恶性非正式制度,前者多指能够与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正式制度相容、方向一致的非正式制度;而后者是指与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不相容的非正式制度。一般而言,人的社会行为的形塑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约束的结果,但是要形成有利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行为良性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功能则是必须的,即在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功能结构中良性非正式制度的功能应居于主导核心地位。一旦人们枉顾良性非正式制度,而以恶性非正式制度作为其行为的依据时,良性非正式制度实际上处于了边缘性困境之中。良性非正式制度的边缘化在导致正式制度软化的同时,也使人的荣辱倒置行为缺乏制度约束。笔者认为在现在良性非正式制度的边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恶性非正式制度的潜规则的盛行。影响人们诚信、正义、公平等认知的各行各业不良“潜规则”,使人们把本不正常的事当做正常的事来看待,盛行使其成为社会实际奉行的现实规则,无论是正式制度和良性的非正式制度却以名义身份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个人或者小团体利益的“潜规则”,必然导致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假冒伪劣等现象。而当普通民众对于潜规则的认同感有所强化时,在制度体系的建构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人们的荣辱观彻底被颠倒了。

三、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的制度安排

制度对荣辱观的建构具有重要功能,所以以一定制度安排来改变社会主义荣辱观制度功能失调,是解决社会主义荣辱观缺失这一难题的重要路径,这也意味着如果缺少制度的支撑和保障,那么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创造良好社会风气,进而建立有序社会秩序必然成为空中楼阁。针对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中制度功能失调这一问题,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的制度路径关键就是提升正式制度执行力和限制恶性非正式制度。

(一) 提升正式制度的执行力

当人们把利益看得比荣辱名声更为重要时,即便人们知道什么是荣、什么是耻之后,未必会趋荣避耻,如何纠正“讲荣辱者吃亏,不讲荣辱者获利”的理念和行为,好的制度发挥着刚性作用。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甚至最好的人也可能被权力腐蚀。……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7]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对于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邓小平同志阐释了:制度好,可以让坏人也无法做可耻性的坏事;制度不好,连好人也无法做荣誉性的好事,甚至要走向反面做可耻的事。

好的制度的衡量标准不仅包含其制定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其高度的执行力。2010

年3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健全制度很重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更为重要”。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制度执行力指的是正式制度的执行力,正式制度执行力包括法律、规章、条令、政策等被执行落实方面的执行力。提升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相应制度的执行力实际上就是通过具体的制度执行行动,使得光荣行为受到激励或奖赏,可耻行为受到处罚,即做到荀子所提出的“荣则达,辱则穷”。要提升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所需要的正式制度的执行力主要是以下途径:

1. 培育人们的制度精神。制度执行力的弱化和制度精神淡薄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没有制度精神,无论制度体系的制定多么完备和科学,它也不能有效实施,制度的权威性难以树立。在我国面对制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超越和逃避制度,“投机为王,逆规称霸”、“下不为例”等反映了我们制度精神的淡薄,培育人们的制度精神是提高正式制度执行力的前提。制度精神重要的不仅是让人们了解制度,重要的是愿意遵守制度,并使得遵守制度成为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即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一个行动者如果具有自觉的遵守合理规则的意识,那么他就会努力准确地、完整地诠释规则的含义,不仅根据规则的条文、而且根据规则的精神实质来决定特定的情境之下如何准确地解释和执行这条规则。”^[9] 培育人们的制度精神实际上是制度社会化和内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施依赖于教育、传播媒介的作用,所以必须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大众传播等向社会公众传播民主法制观念和权利责任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对制度强烈的敬重感和责任感。

2. 形成制度执行的长效机制。制度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必要的监督和制裁机制,而且这种监督和制裁机制必须是长效性的,对于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贪污受贿等行为,绝对不能仅仅通过定期的集中式巡查、处罚来进行,如果制度执行仅仅在短时间内起到实质性的约束作用,而没有形成长效的运作和落实机制,有的人就会根据制度的短期运行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规避制度以获取收益。要形成制度执行的长效机制,离不开制度执行主体,现在正式制度之所以常常遭遇执行不力的瓶颈,与制度执行者的“执行阻滞”有关,如敷衍塞责,只是象征性地采取执行措施,所以必须加强对其监督,并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对执行主体的不予执行或者执行不力的行为予以惩罚。

(二) 限制恶性非正式制度

在重视正式制度对于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防止“制度神话”倾向,即想当然地认为正式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要一切都按正式制度去办,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由于人的行为总是伴随着情感、思维、动机,这些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精确量化和描绘的,所以以有限的正式制度设计是无法解决无限的发展问题。正如诺思所言,“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占决定人们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14] 所以,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一定要规避恶性非正式制度对人的荣辱观念及行为选择的消极影响。

非正式制度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不仅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性,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甚至有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要避免社会荣辱倒置现象,必须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封建残余的思想观念及对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消解,形成意识形态的共识。以意识形态整合来形成共识信念是限制恶性非正式制度的根本途径,意识形态的整合主要是通过正面舆论和道德文化的引导实现的。

1. 加强正面舆论的引导。由于恶性非正式制度的盛行离不开负面舆论,所以如何加强正面舆论对人们观念和行为的引导,是限制恶性非正式制度存续的重要途径。人们对于一些恶性非正式制度的评价受到其在电视、网络等拟态环境所提供的信息的影响,当这些媒介所提供的一些信息,以近乎褒扬性舆论来隐喻认可和利用恶性非正式制度给自己所带来的收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时,有的人会以恶性非正式制度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因为对于“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的谴责和赞许就是生活的主宰”。^[10] 如大众舆论过度娱乐化

和功利化的倾向,使得个人本位价值理念得以滋生和泛滥,造成人们对于荣辱评价的混乱。实现正面舆论的引导,关键是主流媒体必须以主流的意识形态来对负面舆论的信息进行纠偏,以规范受众信息理解偏好。这实际上要求主流媒体必须对大众舆论的消极的传播内容、形式有着清晰的了解并予以尖锐的批判,在媒介领域的竞技场中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同时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总是隐含着从业人员有关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的认知,因而贬斥和抵制恶性非正式制度是媒介从业人员应该承担的责任。

2. 加强道德文化的导向。中国是一个重道德伦理、轻契约传统的国家。由于道德实现更多地是依赖个人内心对道德的信念,当人屈从于功利和诱惑时,就会形成与社会所提倡相悖的道德理念和行为。实现道德文化对社会的引领,要发挥家庭、学校、职业在道德规范培育中的协同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家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重点人群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发挥在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礼仪等所蕴含的优秀道德资源的优势,使得人们在正确荣辱观或者良知指引下规范自己的行为。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者以完全不同机制影响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和践行,但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决定了提升正式制度执行力和限制恶性非正式制度是相互促进的,即提升正式制度执行力有利于限制恶性非正式制度,限制恶性非正式制度有利于正式制度执行力的提升。所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制度培育路径,应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而这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是有高效执行力的正式制度和良性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 [1][美]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刘守英,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 [2][美]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M]. 万俊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85.
- [3]史砚澍,陈东勇. 制度的信息知会功能及其改进[J]. 求实,2010(S1):105.
- [4][日]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M]. 周黎安,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5-16.
- [5]高兆明. 制度公正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34.
- [6][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黄晓京,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87.
- [7][英]卡尔·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M]. 傅季重,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91.
-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 [9]袁国玲.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规则意识探析[J]. 学术交流,2011(8).
- [10][美]爱德华·罗斯. 社会控制[M]. 秦志勇,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69.

Institutional Path of Fostering Socialist Concept of Honor and Disgrace

LI Weijun, WANG Zhongch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Abstract: Fostering socialist concept of honor and disgrace is a long-term systematic project, for which institutions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by notify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conferring reward and punishment according to specific conducts. Nevertheless, mollification of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marginalization of benign informal institutions result in disorder of institutional functions in fostering socialist concept of honor and disgrace. To enhance executive force of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o curb malignant informal institutions can help establish and fulfill the concept.

Key words: socialist concept of honor and disgrace; formal institutions; informal institutions

(责任编辑:黄仕军)